

荔园文创译丛 | 李凤亮 主编

PUBLIC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POLICY

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

比较的视角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美] 凯文·马尔卡希 (Kevin V. Mulcahy) 著

何道宽 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荔园文创译丛 | 李凤亮 主编

PUBLIC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POLICY

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

比较的视角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美]凯文·马尔卡希 (Kevin V. Mulcahy) 著

何道宽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
(美)凯文·马尔卡希著;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355-3

I. ①公… II. ①凯… ②何… III. ①公共管理—文
化工作—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0882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
比较的视角

[美] 凯文·马尔卡希 (Kevin V. Mulcahy) 著
何道宽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355-3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1/2

定价: 40.00 元

PUBLIC CULTURE, CULTURE IDENTITY, CULTURAL
POLI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 Kevin V. Mulcahy 2017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Public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Poli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y Kevin V. Mulcahy.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荔园文创译丛”（第一辑）总序

“荔园文创译丛”是由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发起并组织，编译国外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前沿论著并在全国发行的系列译著。本译丛旨在嘉惠学林，连接文化创意产业政、产、学、研诸界，为我国高校师生、研究机构学者、政府文化部门管理者及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提供了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新理论、新动向、新热点的窗口。译事不易，原作的选择我们尤其慎重。“荔园文创译丛”编译计划自2014年发起以来，我们遍访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国家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该领域学术著作，从中外学者和商务印书馆编辑推荐的数十本外文著作中精选出本套丛书。我们选取了美、英、法、澳四国文化研究及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具有前沿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书四本，经审稿委员会专家审阅，同意将其作为“荔园文创译丛”第一辑书目翻译出版。寒暑易节，经过编译团队3年多的昼夜奋战，本译丛即将付梓。通读这四本论著清样，我惊喜地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前沿性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教授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他的《创意产业读本》（中文版）曾被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专业的教材。哈特利教授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产出量，而且不断挑战学科边界，探索学术前沿。是次推出的《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便是这样一次学术突围的前沿性成果。在这本新著中，媒介理论家、文

化理论家约翰·哈特利和演化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家贾森·波茨（Jason Potts）向我们展示了行为科学和文化研究统一的愿景，突破了传统学科疆界的疆界。两位作者综合了跨度可观的文化研究、语义学、符号学、复杂理论和进化论、社会学、人类学、认识论哲学等学科，推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法，将知识进化论、文化进化论和语言意义进化论融为一炉，借以研究文化如何通过意义演化，形塑群体，增进知识。《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意在推出源自文化动力学而不是经济环境的研究路径，还重点探讨了创意城市和复杂的文化系统，对当下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创意城市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较强的参照意义。哈特利教授团队于2012年发布了“创意城市指数”，这项成果以新方式回答了文化在形塑城市中的作用：为何一些城市是创意性全球都会，而另一些城市则不是？《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始终在思考：什么因素构成创意城市的潜在优势？作者认为，文化不是城市吸引人的要素，而是符号生产资源；在应对复杂问题时，资源使城市成为演化的、自组织的、极富生产力的机制。我相信，如果这些真知灼见能被运用，中国的文化建设理念和面貌必将发生变化，我们将不再生硬地隔离和复制濒危的文化形式，而应该发挥文化的成长性和弹性，将它们带上进化和变革之路。

二、经典性

当前，我国已跨入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书籍易得，但精品难寻，学术译著尤甚。但我们编译团队却在书海中幸运地找到了这批具有经典性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作。以《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一书为例，这是北美杰出的公共文化政策学者凯文·马尔卡希（Kevin V. Mulcahy）教授的扛鼎之作。他躬耕公共文化政策领域40余载，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学院公共政策与行政专业创建文化政策专业方向。他的《文化政策：概念界定与理论路径》一文是《艺术管理、法律与社会》（*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杂志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优秀论文，其他系列论文也在艺术管理和文

化政策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早年在美国布朗大学和宾州大学接受了严格的政治科学训练，又对文化艺术问题情有独钟，是研究文化政策的最佳人选。相对而言，他的学术产出不大，但凡推出的却都称得上佳构。他学术视野开阔，善于深入浅出地阐述自己敏锐的学术见解。这些特征都鲜明地体现在《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这一最新力作中。比如他论述“公共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差异时，认为“公共文化”提供的是我们之“需要”，而“娱乐文化”提供的则是我们之“想要”。“娱乐文化”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多半是由于它们是熟悉的、有保障的；相反，“公共文化”领域提供的机会是考虑我们可能“需要”什么，那样的需要可能是困难的、有争议的 and 陌生的。一语中的，让人不得不佩服。

三、跨界性

跨界合作、融合发展是当前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努力融合科技与人文艺术，但现实情形是科技界不懂创意，也不欣赏依赖直觉的思维方式，而文化艺术界又不懂技术。既懂技术又懂艺术的复合型跨界人才成为稀缺资源，在学界也少有技术专家愿意跨界投身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而本译丛的《符号性商品的产业化——基于文化产业的创意产业》一书作者们便是这少有的技术专家团队。他们是信息和通信科学领域教授飞利浦·布吉庸（Philippe Bouquillion）、贝尔纳·米埃及（Bernard Miège）和皮埃尔·莫格林（Pierre Mœglin）。这是一本技术专家研究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专著，该研究继承了前人对媒体的社会经济、文化产业理论和通讯政策经济的研究成果。在文化产业领域，该书研究了图书出版、录制音乐、新闻、视听相关的电影业等传统行业以及电子游戏、信息媒体等新行业；而关于创意产业，该书研究了时尚、奢侈品和艺术手工业。作者站在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前沿，阐述了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对创新的需求和对复制性的限制的持续共存。作者致力于解决技术发展对文化产业造成的冲击从而形成的新问题，比如：

服务于创意经济的信息经纪、政府对符号性商品的监管政策、数字创意产业的公共政策等前沿问题，作者还表达了对“文化例外”和以“文化多样性”名义出台的支持政策的质疑。这也充分印证了我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内在机理与战略路径研究》时的一个结论：相比之下，科技界的文化自觉似乎整体上高于文化界的科技自觉。值得一提的是：飞利浦·布吉庸教授团队在探讨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区别时引用了本丛书作者之一约翰·哈特利教授2009年发表的学术观点：“创意”艺术属于一个方面；“文化产业”如媒体和电影则属于另一方面。跨界、跨地域学界精英在这套译丛中自然神会。相信这样的跨界探索能够给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政、产、学、研界提供诸多启迪。

四、在地性

我们深知，引进译著，目的在于为解决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参照和借鉴。《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一书便是这样的一本具有较强在地性和参照价值的新著。这是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最新力作。金匠学院于1891年以工艺和娱乐学院（Goldsmiths' Technical and Recreative Institute）之名成立，后于1904年并入伦敦大学，更为现名，专攻传播媒体与文化创意、艺术课程。安吉拉·默克罗比是英国媒介与传播学家，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传人。她受业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本书书名里的“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ies）一词，就意在彰显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阿多诺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渊源。与本译丛其他几本论著相比，本书充满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后福特主义气息和创意现场气息。很多章节内容就来自于她在金匠学院课堂教学活动中与学生的讨论和她对伦敦和欧洲其他创意城市的产业观察。她介绍自己的访谈经历、学生的创新创业成就，通过众多社会项目和社会企业的案例，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后创意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围绕欧洲社会对文化经济和创意经济的论辩，她研究创意就业机会问题、新形式的社区建设问题、新形式的文化经济开

发问题、潮人经济问题。这些研究饱含时代气息，相当接地气，“企业式大学”“教学机器”“数字工匠”“新手工艺人”等概念的提出和探讨何尝不是对中国问题的预研究？

译事艰辛，译丛组织同样不易。在此套译丛即将发行之际，回首这三年来围绕译丛所作的工作，我首先要向主译何道宽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他译著等身依然勤奋笔耕，夙兴夜寐，为中国传播学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学科建设倾情贡献才华和力量。作为资深翻译家，他不仅满腔热忱，而且虚怀若谷，对于后学指出的错讹或笔误能虚心接受，并迅速完善。衷心感谢法语翻译石冰怡老师！她是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高材生，顶着身体不适和赴法公干的压力高质量地完成了本套译丛的法语翻译重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译者编者多方互动的经历，我们深知，尽管我们已经如履薄冰地尽力减少翻译的错讹和失误，但“文化折扣”依然存在，错讹误读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感谢周建新、张晓红、黄玉蓉、温雯、邓文君、张晗、乔纳森·帕奎特（Jonathan Paquette）、哈桑·巴克什（Hasan Bakhshi）等老师为本套译丛的遴选、审定、组织、编校费心费力。相信读者朋友的认可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最佳犒劳！

李凤亮

2017年金秋于深圳

作者中文版序

凡讨论文化政策者无不考虑政治文化之重要意义，政治文化赋予各国公共文化相应的意义。因此，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时，必须考察其历史与传统，因为界定文化认同的正是历史与传统。和普通政治一样，文化政治涵盖民族的集体价值、个人和集体认同的情感，以及献身的情感。据此精神，习近平主席 2016 年号召中国艺术家增强文化自信，创作鼓舞人的经典作品，以振兴中国。

一、作为公共政策的公共文化

我的《公共文化》始终强调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这必然涉及与西方殖民主义苟延残喘的霸权主义的斗争。我用殖民性（coloniality）一词来表示帝国主义残余。这是强权国家企图继续控制其他国家的政策，殖民性不仅是政治经济的控制，而且是文化的控制。

“东方主义”之类的概念力量强大，其霸道使被殖民的人民相信，欧洲文化身份比非欧洲文化身份优越。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必然要求独特政治文化和独特公共文化的建设，舍此就难以实现完全的主权。后殖民性话语强调文化在摆脱帝国主义并获得解放中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前殖民地的人民认识到，殖民者给他们留下了刻板印象，遂起而抗争。实际上，文化与政治难分难解，两者与民族认同的再彰显更加密切。寻找有别于殖民历史的另一种历史话语，这是后殖民公共文化（post-colonial public culture）创建的基本要素。对去殖民化的人民而言，文化重建政策是政治重建的必要补充。新近获得独立的人民开垦自己的历史，这是重获政治主权的必备要素。

前殖民地国家奋力超越殖民性的影响，超越征服与屈从的持久影响，这是超越霸权价值的决定性任务。殖民性是“谁统治谁”（who rules whom）经典政治表述的变异形式，它问的是“谁界定谁”（who defines whom）。文化帝国主义扭曲人的身份关系，本土的声音为争夺身份话语的控制权而斗争。实际上，后殖民社会（post-colonial societies）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换言之，它们要创建自己的文化特色，而不是让他人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根本上，这就是文化建国的过程。习主席认为，这是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中国人要抗拒对西方价值的盲目接受。对艺术家和作家而言，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振兴中华文化传统、建设现代中华审美价值观是其责任所在。

二、北京奥运会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象征，也是中国文化大国地位的象征。此外，这届奥运会给中国赢得全球受众的机会，使他们能观赏到这一超级盛事，这是介绍新中国的宏伟场面。新中国政策的总精神可以被描绘为“现代性与连续性”。其次一个主题可以被描绘为“和谐与纪律”。

中国展示的形象是：天衣无缝的历史现实，新与旧寓于现代性与纪律的环境里。实质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一个平台，借以庆贺新中国文化自觉的复兴。开幕式展示的形象用上了传统文化形式比如京戏，它们与现代性的形象比如摩天大厦并置在一起。北京奥运会赋予中国机会，让它向世人展示自1949年以来的伟大历程，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中国能证明，它再次成了世界大国，不仅是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而且是文化大国。

北京奥运会的组织精准严密，让世人看见中国人的自信。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整，开幕式准时开始，参加表演的共有2008人。（不妨指出，数字8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产生发财和好运的联想。）总指挥是享有盛誉的导演张艺谋。在他看来，开幕式意在证明中国富有活力的文化，它把过去的伟大和现在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了。

我们可以挑选开幕式的两种仪式来证明其总体构想。首先，烟火表现的大脚印连成一排，从天安门沿中轴线直达奥林匹克体育场，其意在唤起中华帝国的文化。其次，大队鼓手的表演发出的讯息是精准、技艺与活力，这是现代中国的象征。支撑开幕式的总体理念是强调国家“为人民而发展”的现代化战略。北京奥运会可以被视为软实力外交的排练，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庇护下，北京奥运会在世界舆论场上塑造了中国积极的形象。稍后，习主席鼓励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成为表现中国精神的排头兵。

总之，北京奥运会用视觉形象展示了中国文化认同的复兴，它把中国的形象投射到世界舞台上。以此类推，所有的国家都能认识到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每个国家的文化认同都能得到其他国家的确认。这是所有国家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2005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确认了这样的权利。

三、谢意

何道宽教授将本书译成汉语，令我不胜荣幸。他使我的书通达深刻理解文化政策的广大中国读者。他的译文典雅，他使中译本及时问世，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感谢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黄玉蓉教授。她率先促成这项译事，并使之落实。此外，她始终支持我在中国的学术交流。最重要的是，她坚持不懈地支持文化产业研究。她自己的著作和她推动的成果见证了她的追求。

谨对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致以深深的谢意。深圳大学的领导促成我到深圳参加文化研讨会，谨表谢忱。

最后要感谢我的本科研究助理罗伯·文森特。

凯文·马尔卡希
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2017年6月2日

谨向我所有本科学生中的研究助理致谢

译者前言

一、一见钟情

2017年3月，“荔园文创译丛”编委会委托我评估 *Public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Poli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一书。我在两天之内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兹将评语里的两个重点摘抄如次：

(1) “《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为文化政策研究，多重视角比较，跨学科视野，涵盖面广，融政治、身份认同、艺术、政策为一炉；检视文化和政治决策的互相影响，涉及艺术管理、文化研究、历史、文学、表演艺术、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把文化艺术的公共支持置于公共政策决策的棱镜之下，在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框架中予以考察，具有显著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特征；把众多的文化政策与政治和身份认同的关系编织起来。其基本预设是：文化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文化界定国民的身份认同和个人价值。”

(2) 《公共文化》“非名家名作，但有名家名作的潜力”。

由此可见，我对这本书“一见钟情”。

译稿杀青之后，我对这本书成为“名家名作”的前途更加看好了。

二、轻松愉快

因为喜爱，两天之内浏览完这本书，并做出比较中肯的评价。

因为欣赏，两个半月译完这本书，轻松愉快。

为什么喜爱并激赏它，因为：

(一) 历史脉络非常清晰。比如，法国为什么被称为“文化国家”？

因为其近现代文化成就辉煌，自信法兰西文明的普世价值，长期坚持文化输出，高举“文化主权”、“文化例外”的旗帜，捍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的公约》，与美国的文化霸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又比如，加拿大为什么与法国联手阻击美国，为该《公约》的达成作出贡献？因为它长期患有“小国大邻综合征”，受美国文化霸权的压迫，有“加拿大美国化”的危险。

（二）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特征。本书研究公共文化尤其文化政策，述及十余个国家和文化区，重点研究法国、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学理有据，举重若轻。作者本行是政治学，但文化史学养深厚，其观点和结论都论证严密、说服力强。

（三）风格平易近人，文字清丽，读之令人神往，欲罢不能。

（四）学术品位高，却没有学究腔，难能可贵。专用术语界定清晰，明白如话。本书开卷时专辟一栏“关键词”，予以精到解释，又在不同的章节里反复解说，使之如常用词汇一样受人欢迎。

（五）批判锋芒犀利。比较美国和法国的公共文化政策：美国的“隐形之手”和法国的“文化输出”。

（六）描绘奥运胜景的政治、政策和文化认同。撷取三个夏奥会（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一个冬奥会（2014年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比较东道主张扬自己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政策取向。

（七）分别用三章论述“殖民性”、“内殖民经验”和“文化空间”，对读者有启蒙之功。

三、关键词

卷首设“关键词”一栏，含29条，予以解释。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个：Cultural Policy/文化政策、Coloniality/殖民性、Cultur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ommodification/文化商品化、Cultural Diplomacy/文化外交、Nations-State/多民族国家、Post-colonialism/后殖民主义。读者可以在“关键词”词条下检索其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在正文里检索其用法。

一个小小的疏忽是，书名里“公共文化”和“文化认同”这两个关键词没有被纳入“关键词”，是为遗憾。其他的遗漏还有第五章标题里的关键词“内殖民经验”（internal coloniality）。

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需要费一点笔墨在“译者前言”里介绍：文化民主化、文化民主、文化空间、文化国家、隐形之手文化、殖民性、内殖民经验等7个。先介绍文化民主、文化民主化、文化空间。其余的4个（文化国家、隐形之手文化、殖民性、内殖民经验）放到“译者前言”的第五部分“快速扫描”的相应章节里介绍。

首先说文化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和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的区别。

文化民主化是自上而下的路径。他说：“文化民主化是自上而下的路径，本质上使某些文化节目优先，让被视为公共善举的项目享有特权。”（第12页）他又说：“文化民主化通过计划使艺术性出色的作品送达公众，这些计划使更多的人能参观社区的博物馆，能享受到表演艺术团……”（第210页）“文化民主化养成普通公民的审美启蒙，提升其尊严和教育水平……”（第210页）

相反，文化民主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他说：“文化民主的目标是在表达机会的定义和供给上提供一条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路径。本质上，这里的政策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了。”（第211页）“文化民主常常引起争议，因为它支持许多非典型、非寻常的艺术。”（第212页）

作者主张这两种政策取向的综合，认为这是“宽松路径”的文化政策：“文化民主化和文化民主两个目标引起关乎公共文化内容的辩论：“精英主义的”或“平民主义的”的辩论。实际上，精英主义对文化民主化的关系宛若民众对文化民主化的关系。如上所示，这种“宽松路径”的综合政策更容易捍卫，更符合民主的文化标准。”（第212页）

接着介绍“文化空间”（有人称之为“地方民族主义”）。

这个概念和术语并不常见，本书的界定清晰、严谨。浓墨重彩的描绘的令人击节，突出的例子有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区、美国路易斯安那卡津人的家园。

他说：“本书所谓文化空间指的是一国之内的小地理区，共同的历史感把它们扭结在一起……文化空间的例子有：加拿大的纽芬兰和滨海省；法国的诺曼底和普罗旺斯；德国的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州；意大利的撒丁岛和西西里；英国的康沃尔和约克郡（威尔士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区）；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夏威夷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卡迪亚。”（第29页）

再说“文化国家”。

按文化政策的政治价值，作者区分四个价值系统：文化国家，文化保护主义，社会民主文化，自由放任文化。他介绍了几个文化国家：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并没有正式给文化国家下定义，但我们能从一两句引文中意会其含义：

“法国人把文化视为法国文明的基本要素，具有国民团结的意义，这是法国社会的显著特征……法国是否拥有统一的法兰西文化，那是在法国革命中确立的、一直被奉若神明的文化意识。”（第3页）

相反，美国的公共文化还“卖不动”，因为许多美国人总是抗拒“大政府”的观念，尤其反对“文化国家”的观念。（第10页）。

四、几个亮点

（一）苦心和爱心。看得出来，这是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在几年重病就医的岁月里，作者一心为读者着想，打造出一本异乎寻常的书。除了全书骨干的六章外，精心撰写了绪论、导读和结束语。即使只有那六章，没有“额外”的绪论、导读和结束语，这也是经得起岁月汰洗的佳作。

（二）异乎寻常的绪论。这是一篇浓缩的论文，长达14000字。我们不妨给它加上一个题名——“公共文化、公共政策、政治文化的类型、目标和理据”。根据文化的价值系统，作者把公共文化分为四种类型：文化国家，文化保护主义，社会民主文化，自由放任文化。

（三）“导读”的三大功能：（1）衔接绪论和正文，（2）宛若全书“摘要”，（3）画龙点睛，区分娱乐文化和公共文化。

（四）文化政策领域的国际斗争。他写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